

明代孔廟罷祀荀子之歷程及其意義*

田富美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提 要

從祀孔廟意謂著進入儒門聖域，身後獲得傳承聖人之道的肯認，因此，即使國君仍是最終的裁定者，但對從祀儒者的取捨進黜，卻成為朝臣廷議中政治勢力的角力場域、儒門流行中道統嬗遞的攻駁論壇，荀子在明代黜祀的歷程，即是一鮮明之例。本文首先梳理明初至嘉靖時期奏章、《實錄》、儒士對荀子從祀之評議，說明荀子遭黜祀的真正原因，實不在於經典著述不足，亦非德行表現之疵，而是在於所言性惡、禮偽、非十二子等主張，不見容於當時逐步邁向學術主流的程朱理學；其次，指出罷祀事件中所昭示明儒建構的從祀判準思維，應是從「報功」的觀點來衡量，亦即對「聖人之道」的護持、傳衍中有所貢獻者。最後說明，若依照明儒所建構的思維模式，從祀與否應取決於儒者在當時代的發展及所肩負的意義，則在儒學動態發展與多元趨勢的前提上，荀子可說是與現代儒學接棒的最佳人選，若得以復祀孔廟，必當深具時代意義。

關鍵詞：明代荀學 孔廟 從祀 程朱理學

* 本文原作〈荀子在明代罷祀孔廟之歷程及其意義〉，宣讀於「第三屆荀子思想現代價值論壇：荀子思想與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會議地點：中國山東蘭陵，2016年10月9-10日），惠蒙《淡江中文學報》審查委員針砭斧正，得以補苴訂謬，謹致謝忱。

明代孔廟罷祀荀子之歷程及其意義

田富美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引言：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對於帝制時期的中國儒者而言，從祀孔廟意謂著進入儒門聖域，傳承聖人之道，身後獲得肯認的象徵。是以，自唐太宗貞觀年間下詔以左丘明（約前 502-前 422）等二十二人為先師，侑食孔廟，逐步形成從祀制度後，^①即使國君仍掌握最終裁定的權柄，但對從祀儒者的取捨進黜，卻成為歷代朝臣廷議中政治勢力的角力場域、儒門流衍中道統嬗遞的攻駁論壇。明儒瞿九思（？-？）即言：「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②先賢先儒的從祀、罷祀，自是不容忽視的。荀子從祀始於宋神宗元豐 7 年（1084）依禮部侍郎林希之議：「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③封為蘭陵伯，並入祀孔庭；自此後儒者異議即不曾間斷，至明嘉靖 9 年

① 有關孔廟從祀制度的形成，參見彭珍鳳：〈先賢先儒從祀孔廟東西兩廡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33 卷第 3 期（1982 年），頁 53-116；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1994 年），頁 217-311。案：影響孔廟從祀制度訂定或更制的因素甚為複雜，最後仲裁的決定權雖決定於國君，然其中涉及自身性格好惡、政局穩定、統治需求、學術發言權轉變等考量，牽涉範圍頗多；本文則僅就明代朝臣對於荀子在孔廟置黜之觀點進行梳理，關注焦點在於藉此考究明代的荀學之一隅。

②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年，《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歷史文獻叢書》影印明萬曆 35 年刻本），卷 5，頁 45 上。

③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年），卷 14，頁 13 左。案：林希言：「唐貞觀二十一年以伏勝、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

(1530) 按首輔張璁(1475-1539) 建請孔廟禮制變革之議，被歸為罷祀之列的荀子，遷出孔庭，至今再無復祀。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朝孔廟祀典的更制，並非一蹴而成，且牽涉的層面甚廣，自明初以至嘉靖朝，諸多官員的議禮奏章已可窺知一二；而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更顯示從祀議題受到的關注。^④而有關荀子從祀的論題，亦隨著朝臣對從祀先儒評議中屢次被提及，包括嚴厲抨擊荀子從祀地位，或藉貶斥荀子以求褒置其他先儒；當然，也有主張應遵循先祖所遺留下的規制，從而反對荀子黜祀。這些觀點，隱含著對「聖人之道」內涵的論述，同時擘畫出其傳承者的先儒圖象。黃進興曾概括地分析了荀子自宋代從祀孔庭，至明世宗時遭罷祀，到清中葉出現要求復祀建言等情形，且對於明代的從祀準則作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說明，言：

細繹該時代的從祀標準，無非是以「傳道之儒」取代了「傳經之儒」，而其所標舉的「道」正是理學一系的「孔孟之道」，而非荀子之道。^⑤

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又荀況、揚雄、韓愈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成為缺典。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配享，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

④ 如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125-163；趙克生：〈試論明代孔廟祀典的升降〉，《江西社會科學》第6期（2004年6月），頁104-110；張璉：〈明代嘉靖朝宗廟禮制變革與思想衝突之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頁1-38；吳靜芳：〈明嘉靖朝孔廟祀典改制考析〉，《成大歷史學報》第31號（2006年12月），頁113-152；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第56期（2015年12月），頁35-86。

⑤ 黃進興：〈荀子：孔廟從祀的缺席者〉，《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94。案：黃進興對嘉靖時期孔廟改制的論析，參見〈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一文，頁276-277。該文指出嘉靖改制是有意標新立異：「立異」的是把傳經之儒與傳道之儒分開對待；「標新」的是以王通、胡瑗從祀，「促成『明道之儒』自立門戶而不復依傍於『傳經之儒』之下」。並表示：「『立德』優於『立言』，『明道之儒』有凌駕『傳經之儒』的趨勢。」

明代從祀的改革，使得漢唐時期的經師退居次要，轉而以闡發理學體系的儒者躍居主流；且在理學家建構的「孔孟之道」判準下，自然是將荀子排除於「傳道之儒」之外的。這樣的觀察，實勾勒出嘉靖朝孔廟從祀變革所代表的學術轉向及特色，深具意義。然而，以之檢視荀子罷祀情形，則似乎仍可進一步探究。首先，據宋臣林希請祀荀子之議，荀子得以從祀孔庭，是在於「發明先聖之道」，屬「傳道之儒」，並非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戴聖（?-?）、孔安國（?-?）等「傳經之儒」緣於「偏善一經」，屬於羽翼儒家經典的「先師」角色，換言之，以「傳經」、「傳道」二分從、黜孔廟，並不盡符於荀子之黜祀的原則。荀子遭黜的原因，恐怕該是在於當初從祀時所持「發明先聖之道」的標準，至嘉靖朝所欲彰顯聖道傳承者的條件已有所不同，其中的轉化脈絡為何？宜有更明確的闡析；再者，嘉靖朝更置從祀的判準，透顯出對從祀孔廟之思考為何？按此思考範式，從現代學術研究觀點來看，則能否尋繹出荀子得以復祀孔廟的觀點？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首先將透過明初至嘉靖時期朝臣請祀與議禮奏章、《實錄》對相關事件的載錄、儒士對此課題的論斷等，梳理出荀子罷祀的歷程；其次，指出罷祀事件中所昭示明儒建構的從祀判準思維，應是從「報功」的觀點來衡量，亦即對「聖人之道」的護持、傳衍中有所貢獻者；最後，嘗試藉由前述分析，說明若以明儒此一從祀判準的思考範式來衡斷現代學術的發展，則荀子得應復祀的可能性。

二、荀子罷祀孔廟之歷程：

「首明王道，推尊孔子」／「學失大本」

批判荀子忝列從祀的聲音，自宋代末年已發端，至明代成為孔廟更制討論中屢屢論及的議題。宋末儒者熊鉉（1247-1312）在其〈祀典議〉一文中，提出「兩廡從祀，理宜損益」，認為孔庭從祀的儒者必須有所增、黜，他提揭從祀的目的在於「盡吾報本之心」，意指對聖道有所貢獻者的崇敬，故而認為從祀者「必其

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這是以「報功」為從祀標準的理路，開始出現了部分端倪。另一方面，熊鉉從德行的角度批評了貞觀 21 年（647）按有「訓詁之勞」的從祀儒者中，「為竇憲章作奏草」的馬融、「建短喪之議」的杜預，^⑥皆不足取；另一方面又言：

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不刊之定典也。^⑦

引文中所論的「大本已失」，顯然是源自於程子對荀子的批評，^⑧這是從學術主張的偏正與否來論斷荀子的從祀問題，換言之，不僅「訓詁之勞」並非從祀孔廟的唯一考量，還需審視儒者生平德行，同時亦須檢覈其義理思想。

明初，對於孔廟從祀名單提出批評者，以明成祖洪武年間的宋濂（1310-1381）最受矚目。宋濂曾批評荀子「才甚高而不見道」，故即使荀子立言不悖於孔門，卻主張性惡，且譏訕子思、孟子，實不足為後世學者效法；^⑨是以，對於荀子獲祀孔廟，自然無法認同：

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⑩

⑥ （宋）熊鉉：《熊勿軒先生文集·祀典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正誼堂全書》），卷 4，頁 10 左-10 右。

⑦ 同前註，頁 11 右-12 左。

⑧ （宋）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伊川先生語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19，頁 316。案：程頤言：「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⑨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諸子辯并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叢書集成新編》第 67 冊），卷 27，頁 267。

⑩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孔子廟堂議》，卷 28，頁 272。

從這段文字中，可看出宋濂所認定的從祀標準，基本上與熊鉉如出一轍，納入了德行與學術主張的考量，且同樣以荀子言「性惡」，故不足以從祀。自此後，「性惡」成為荀子在明代從祀之列中飽受訾議的主要焦點，即使論者沒有要求罷祀，但往往也將之列為貶抑的對象，用以突顯其他先儒進祀的正當性。如翰林院待制王禕（1321-1372）上奏建請增列董仲舒從祀，言：

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¹¹

雖然王禕論及從祀準則仍以「完經翼傳」為主要考量，但卻同樣擴及了德行與學術主張等問題，於是，「荀子之言性惡」再次成為抨擊的對象之一。王禕於文末呼籲：

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¹²

顯然，王禕舉出「荀況之言性惡」的用意，不僅在於反襯出董仲舒足以進祀，同時也直指荀子學術不符聖道，確實不宜從祀。於是，基於「為稱於禮者」的前提，

¹¹ （明）王禕：《王忠文集·孔子廟庭從祀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6冊），卷15，頁307。案：以下簡稱《四庫全書》。

¹² 同前註，頁309。

關於從祀孔庭的先儒是否合宜、以及爭取心目中理想的先儒從祀等議題中，荀子往往成為議論的內容之一。自王禕以「荀況之言性惡」反襯董仲舒從祀的正當性後，近似的論述不時出現：如明英宗時期廣東肇慶府知府王罄、順天府通判曹銘上奏請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等人，亦以「性惡之荀況……尙祀廟庭」；¹³明孝宗時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1446-1499）上疏請祀王通，稱頌王通「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¹⁴皆是從反面列舉荀子之例。

然而，即使自宋末明初已有不少建議罷祀荀子的聲音，但仍有掣肘的意見，如明憲宗成化年間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1409-1469），他曾評價荀子、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等先儒良窳，其中論及荀子：

荀子學聖人者也，然異論不忌，大言不慚，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所事者奸邪之黃歇，所教者坑焚之李斯，是果可以為聖人之徒乎？……朱子之於況雖曰「稱其剛明」，而書況於楚，所以陋之也。¹⁵

除了性惡、禮偽的批評，劉定之更貶斥荀子受春申君之命任蘭陵令，這樣的批評，實屬前此未見；至於因被視為秦王暴政實踐者的李斯而遷罪荀子，則是延續唐宋即有的責難。¹⁶是以，劉定之總評荀子於聖人之道，實「可取者少，而可罪者多

¹³ （明）陳文等纂：《明英宗實錄·正統2年乙亥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卷31，頁617。

¹⁴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四庫全書》第1252冊），卷10，頁173。

¹⁵ （明）劉定之：《呆齋前稿·策畧子類》（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22年楊一桂補刻本），集部第34冊，卷4，頁88。

¹⁶ 最具代表性者，應屬（宋）蘇軾〈荀卿論〉：「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劾。」參見（宋）蘇軾：《蘇軾全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4，頁713-714。

矣」；然而，有趣的是，即使劉定之貶抑荀子的程度更甚於宋濂、王禕之論，但卻仍然認為荀子書具「希聖之心」、「謹守規矩」，故而「得列於名教之中，以與洙泗魯鄒諸弟子、濂洛關建諸儒並為徒黨」，¹⁷傾向荀子仍應納入從祀之列。顯見對於從祀之制改革的保守傾向。只是，此後貶抑荀子、主張罷祀荀子的意見並未因此而消歇，反而更趨顯著。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奏言：

臣嘗觀國學及郡縣學，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後之真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荀況，言或近於黃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以子思、孟軻為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為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學失大本……豈宜列諸從祀哉？¹⁸

張九功對荀子的批評，除了承襲、統整此前儒者之議，另又加上學術駁雜、非十二子等，可說是總集了歷來對荀子的非議內容，包含了一切學行事蹟，以此要求將荀子遷謫出孔廟，其批評的範疇超出過去朝臣之議；與此同時，程敏政亦有奏書討論從祀之文，牽涉範圍包括孔子弟子、先秦至魏晉間經學家黜置與否，以及四配享（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等問題，至於述及荀子從祀，則言：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

¹⁷ （明）劉定之：《呆齋前稿·策畧子類》，卷4，頁88。

¹⁸ （明）張九功：〈請從祀孔庭疏·裨補名教疏〉，轉引自（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四庫全書》1251冊），卷11，頁106-107。該文亦見於（明）薛瑄撰，孫玄常等點校：《薛瑄全集·行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2，頁1628-1629；（明）劉健、謝遷等纂：《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卷17，頁413。弘治元年壬寅條載：「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文廟從祀，世教所關，不可不慎。如蘭陵伯荀況……俱得罪名教，宜黜之。」

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¹⁹

程敏政在認同洪武 29 年（1396）罷祀揚雄之餘，同時亦呼應了張九功建請廢祀荀子的主張。而所持之理由，亦同樣是性惡、禮偽、非十二子等。值得注意的是，從明初宋濂批判荀子時未曾置一程朱之言，王禕僅提揭要求增祀的儒者有助於程朱學術的承繼與傳揚，至成化年間劉定之指出朱子將荀子繫之於楚以「陋之」，再至弘治元年張九功、程敏政逕引程朱之說作為黜祀荀子的論據，²⁰明確地昭示了明代對於孔廟從祀者的檢覈標準逐步以程朱之言為依歸之跡，清儒秦蕙田（1702-1764）即評論程敏政之疏，言：「此疏當時雖未允行，嘉靖九年所定實本與此。」²¹由此看來，透過程朱之言評價先儒從祀恰當與否的方式持續發酵之下，荀子的廢祀幾乎已成為可預見的結果了。

荀子能安坐孔庭兩廡至嘉靖年間，乃因張九功、程敏政奏疏遭明孝宗否決。張、程的奏疏所概括的孔庭相關祀議內容頗多，除了從祀先儒的增黜之外，還包括孔子弟子從祀名單的考證、先賢之父從祀孔子之父啓聖王等事宜，因此明孝宗將之責付禮部會各部廷議。²²當時廷議主導者為禮部右侍郎倪岳（1444-1501），

¹⁹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卷 10，頁 172-173。案：倪岳將張九功〈請從祀孔庭疏·裨補名教疏〉一文繫於弘治元年 7 月 24 日，程敏政〈奏考正祀典〉則於文末載弘治元年 8 月初 3。

²⁰ （宋）程頤言：「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宋）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伊川先生語四》，卷 18，頁 282。

²¹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四庫全書》第 137 冊），卷 120，頁 899。

²² （明）倪岳〈奏議·祀典一〉中，抄錄張九功奏疏後，明孝宗批示「禮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祀、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科道官詳議。」參見（明）倪岳：《青谿漫稿》，卷 11，頁 107。

對於更祀的問題，他提出了相關評駁。²³首先，他從學術上分析：

今議得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所奏，其間考論因為明白，但自貞觀肇興祀典以來，歷代相承八百五十餘年，中間經歷有宋名儒周、程、張、朱數輩，一皆尊禮，未嘗斥議。蓋自周室東遷，世入春秋，諸侯僭王、夷狄猾夏陵遲；至於戰國，王道不明、人心喪失，而荀況首明王道、推尊孔子，況六經之道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間，而馬融、王弼之徒守其遺經……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蓋語其立身之節，不無可貶，語其羽翼聖學之功，亦有可褒，用其言固不可以廢其人，大其功則當有以略其過，庶幾瑕瑜不至相掩，而筌蹄亦豈容盡棄也哉？²⁴

這段文字可看出倪岳反駁張、程奏議的原因，在於倪岳認同唐宋褒置荀子及漢代儒者所持理據，其言荀子「首明王道、推尊孔子」正是呼應宋代林希建議從祀荀子時所言「發明先聖之道」；同時，亦肯定從祀的兩漢、魏、晉先儒傳註經典為聖道流衍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換言之，倪岳謹守唐宋從祀原則，從學術時勢的流變視角肯定經典傳註所具「羽翼聖學」之功。其次，基於張、程皆以程朱之說為立論依據，倪岳同樣引據程朱之見作為護持，他指出：

或以荀況、馬融、王弼、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杜預功微過鉅，疑於可黜，殊不知朱子嘗因〈釋奠申禮部狀〉內備舉孔鯉、孔伋、左丘明、賈逵、公羊高、荀況十哲、兩廡諸賢，考正位次，亦未嘗一言論其非所當祀之意，此非慎於闕疑，則必志於從厚者也。即今南京國子監，乃我太祖高皇帝之所經畫，至精至備。……太祖高皇帝之神謨聖斷，萬世所當遵守

²³ 據《明孝宗實錄》所載，此次官議主事者為「禮部等衙門尚書周洪謨等」，然現代學者考證指出，屬名周洪謨，蓋出於其禮部尚書之地位，真正主導官議者應是禮部右侍郎倪岳。參見（明）劉健、謝遷等纂：《明孝宗實錄·弘治元年8月癸卯條》，卷17，頁414；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頁54註65。

²⁴ （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11，頁113。

者也。且生乎千百載之下，而欲究明於千百載之上，誠為不易；或者前代之所去取，蓋必有深意存焉。²⁵

朱子曾撰〈釋奠申禮部檢狀〉一文，詳細考究了孔廟從祀先儒者之位次，用以與當時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所載差異比較，²⁶由於朱子關注的焦點在於位次先後，自然沒有涉及對從祀者之評價。然倪岳卻引據朱子此文以回應張九功、程敏政引述程朱就荀子學術主張的批駁，倪氏強調程朱不曾對荀子從祀置喙一詞，這樣的回應恐已有失焦之嫌。最後，倪岳更強調文廟祀典的規制，出自明太祖之手，不容輕率更置，這是從政治上強化從祀名單具有一定的權威認肯價值，故而主張「廟庭之祀，除黜揚雄外，其他悉從前代之舊」；且另一方面，基於「前代之所去取，蓋必有深意存焉」，故而應保留歷代祀典舊章所制定之從祀安排，不宜更置。明孝宗最終接受了禮部決議，下詔「是從祀諸賢都照舊不動」。²⁷於是，罷祀之議暫時告一段落。

明世宗嘉靖 6 年（1527），大臣楊一清（1454-1530）回覆世宗探詢歐陽脩從祀等相關問題時，言：「孔廟從祀皆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勳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受聖經，雖學行有疵，亦不敢略。」²⁸其中所言「輔翼六經之功」之見，仍是與劉定之、倪岳一致。對於從祀者的更黜，主要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張璁於嘉靖 9 年上奏之文。首輔大學士張璁在更定祀典儀禮論爭的「大禮議」中之主張受到明世宗支持，由翰林學士擢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成為後續孔廟更置的主導者。²⁹張璁按明世宗諭令，就「先聖先師祀典」進行考證、梳理，以做

²⁵ （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 11，頁 114。

²⁶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釋奠申禮部檢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朱子全書》第 25 冊），卷 8，總頁 4993-4995。

²⁷ （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 11，頁 114。

²⁸ （明）徐學聚編輯：《國朝典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卷 122，頁 1513。

²⁹ 有關明嘉靖時期大禮議之爭研究，參見田澍：〈關於張璁義理思想論述——對張璁在大禮議中「迎合」世宗之說的批判〉，《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1 期（1998 年

爲日後編纂《祀儀成典》之參酌內容，他認爲孔廟祀典事宜必須有所改革：

先聖先師祀典尚有當更正者……茲采今昔儒臣所議先師孔子祀典，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³⁰

張璫的相關奏議非一己之見，而是蒐羅了眾朝臣議論，匯聚而成，內容含括頗多，在孔廟祀典規制的改革上，則包括了孔子諡號、祭祀章服、籩豆樂舞、配享位次、從祀增黜等五項，其中有關荀子從祀的部分，則是於「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八字後，幾乎完全抄錄程敏政〈奏考正祀典〉之內容，包括對荀子的批評、建請黜祀等，張璫僅於引述後評言：

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³¹

足見，對於荀子侑食與否的考量，張璫全依程敏政之議以呈奏明世宗。嘉靖9年，張璫的奏請雖然遭零星臣子的反對，³²然在君主的強力支持下，其主張大都獲得實踐，關於荀子罷祀之議獲准，自此荀子遷謫出孔廟從祀之列。

1月），頁1-7；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頁125-163；張立文：〈論張璫的「大禮議」與改革思想〉，《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4期（2002年7月），頁12-19；張璉：〈明代嘉靖朝宗廟禮制變革與思想衝突之討論〉，頁1-38；吳靜芳：〈明嘉靖朝孔廟祀典改制考析〉，頁113-152。

³⁰（明）朱厚璫、張孚敬：《諭對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37年蔣光彥等寶綸樓刻本），史部第57冊，卷22，頁292；亦可參（明）張璫：《張文忠集·先師祀典或問》（臺北：國聯圖書，1968年，陳子龍、徐孚遠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12冊），卷176，頁20-23。

³¹（明）朱厚璫、張孚敬：《諭對錄》，卷22，頁298。

³²當時反對者，如徐階、夏言、黎貫等均曾上疏，但均遭世宗駁斥，甚至謫官褫職。參見（明）徐階、張居正等纂：《明世宗實錄·嘉靖9年癸巳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卷119，頁2823-2833。

三、荀子罷祀孔廟之意義：「報功」的各自表述

上述大致梳理了自明初至嘉靖年間朝臣對於荀子從祀孔廟的評議，以及最終遭罷祀之歷程。不難發現，這些對於荀子的批判，乃是逐步積累，而其中涉及了明儒對於從祀標準的轉化，故而出現要求罷黜、增祀的情形。更進一步來看，從荀子罷祀歷程中，透顯出明儒在從祀課題上確立了一思考模式——以「報功」為基本的考量：宋代末年熊鉉所提揭孔廟的從祀在於「盡吾報本之心」，³³此一主張到了明代有更清晰的論述：

二年（案：洪武 2 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案：錢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³⁴

洪武 15 年（1382）明太祖曾諭令言：

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

³³ 見註 5。元至正 19 年，胡瑄上疏請祀楊時等五人，其疏言：「我朝既已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足見「報功」之概念一直以來都是從祀基本考量，唯至明代被大量討論、且透過更祀加以實踐。（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 14，頁 19 左-19 右。

³⁴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錢唐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2 年），卷 139，總頁 3981-3982；亦可參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 14，頁 22 右-23 左。

典？卿與諸臣其定釋奠禮儀以聞。³⁵

弘治年間張九功言：

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悠久，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³⁶

程敏政言：

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³⁷

上述四則引文中的「報本之禮」、「報祀之禮」、「報其功」、「崇德報功」，均說明了祭祀孔子的目的在於表達對孔子垂教後世、建立人倫綱常之功的崇敬之意，亦即所謂「報功」或「報本」。程敏政甚至明確地指出從祀者須符合「有功於聖門」、「無疵於公議」之原則。換言之，尊奉「聖人之道」的孔廟，成為學術、文化與政治權力的匯聚之所，那麼所謂從祀者的基本判準，自然是指在「聖人之道」的護持、傳衍中有所貢獻者，因此，不同時期的各個儒者面對外在環境的衝擊、內在學派的挑戰，必然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其對「聖人之道」的貢獻自然會有所差異，故而孔庭從祀者理當隨之有所增黜。釐清明儒此一思考模式，方能更清楚掌握荀子罷祀之緣由及其意義。

³⁵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14，頁23右。

³⁶ （明）張九功：〈請從祀孔庭疏·裨補名教疏〉，轉引自（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11，頁106。

³⁷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卷10，頁170。

唐貞觀年間擇取從祀之先儒，除「親承聖教」的孔門弟子外，又按鄭玄於《禮記》中「凡學官釋奠於其先師」一語，解「師」為「偏善一經」之概念，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 22 人為先師「代用其書，垂於國胄」³⁸，推重其經典傳注、相授之功，這是從祀之制最初建構的判準，以羽翼儒家經典的著述作為「報功」的條件。至宋代，對於孔庭從祀的先儒，一方面以「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為由，增入荀子、揚雄、韓愈；另一方面詔封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張栻、呂祖謙、邵雍、司馬光等人從祀，而所持理由均不出述作發明聖道，開牖後世儒學，³⁹較之唐代僅依經典傳注授受，則宋代雖仍延續以著作為主要的標準，但已非只聚焦於經書疏解，而是擴及先儒人格、學術成就的總體評價，尤其南宋時增祀的儒者，如稱朱子「精思明辨、表裡融渾」，稱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磋講磨」、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等，⁴⁰其考量的範疇，已涉及從祀儒者在實事踐履上的表現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南宋所增列的周、程、張、朱等人，意味著程朱理學獲得官方的認可，理學的道統系譜亦藉由從祀的宋儒中體現。⁴¹

明初至嘉靖年間有關從祀儒者的訾論，以及各種增黜之議，彰顯的實是程朱理學在儒學傳衍中獲官方認可後，逐步走向主流的過程。透過此間述及荀子從祀

³⁸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 14，頁 5 左。案：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 228 亦徵引相關文獻，惟徵引自《唐會要》，故文字略有出入。

³⁹ 如稱朱子「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稱張栻、呂祖謙「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邵雍「述經世書，發先天之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司馬光「著《通鑑》，貽後世法而真履實踐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 14，頁 16 右。

⁴⁰ 據《闕里文獻考》載：「謹按《禮記》云『凡學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據禮為定，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祀典一》，卷 14，頁 5 左-6 左。

⁴¹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頁 217-311；尤其頁 260-264。

的奏議與論及有關從祀標準的主張，便有一清晰脈絡呈現。宋濂是明代首位主張罷祀荀子的朝臣，他認為：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⁴²

宋濂對於從祀先儒的見解，顯然是延續了唐代的標準，差異性不大；另王禕言：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⁴³

成化年間劉定之對於從祀的標準則言：

或親傳聖道於洙泗之上，或收拾聖經於煨燼之後，……或訓註聖經以廣其義，或教授聖經以永其傳，其為人皆可得而稱也。⁴⁴

不論是王禕或劉定之，均將從祀孔庭者分為兩類：一類是親受孔子之教的門生；另一則是後世注疏、傳授經典的儒者。另外，必須說明的是，王禕在要求進祀的七位先儒中，稱譽真德秀、魏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推崇吳澄能「補朱氏之未備」；⁴⁵劉定之則宣稱自己品評荀子、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等人，乃「從朱子而已」，⁴⁶足見，朱子儼然成為「聖人之道」的嫡脈，且是從祀孔廟的判準，自明初至成化年間已有了顯題化的趨勢。

⁴²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孔子廟堂議》，卷28，頁272。

⁴³ （明）王禕：《王忠文集·孔子廟庭從祀議》，卷15，頁306。

⁴⁴ （明）劉定之：《呆齋前稿·策畧禮類》，卷7，頁107。

⁴⁵ （明）王禕：《王忠文集·孔子廟庭從祀議》，卷15，頁308。

⁴⁶ （明）劉定之：《呆齋前稿·策畧子類》，卷4，頁88。

弘治年間張九功的奏議主張從祀先儒名單宜有所增刪，在上述荀子罷祀歷程中，他認為遭程子譏為「偏駁」、朱子「深鄙之」的荀子當黜祀。而薛瑄則「篤志好學，於道有見」，其著《讀書錄》「實為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成為宜增祀的「真儒」。⁴⁷依此來看，張九功論述從祀者所應具備的資格，言：

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以從祀於廟廡，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甚大，豈可苟哉？⁴⁸

文中所論「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的從祀標準，實皆以程朱理學為內涵。換言之，張九功所言的「學術」即指理學，「前哲」自然是指程朱，而程朱理學明確地成為從祀儒者的檢驗標準。程敏政呼應了張九功之論，且更加具體地建立了從祀原則：

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⁴⁹

程敏政所論「有功於聖門」、「無疵於公議」的從祀標準，看似在張九功等人所論的學術成就外，另又增加了德行表現的審核，強化了孔廟在儒門道統傳承功能之餘，且亦肩負了教化之責，其言：「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⁵⁰這是融合了自明初以來眾多論者之見，統整

⁴⁷ （明）張九功：〈請從祀孔庭疏·裨補名教疏〉，轉引自（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 11，頁 107。

⁴⁸ （明）張九功：〈請從祀孔庭疏·裨補名教疏〉，轉引自（明）倪岳：《青谿漫稿·奏議·祀典一》，卷 11，頁 106。

⁴⁹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卷 10，頁 170。

⁵⁰ 同前註，頁 171。

爲一較具體的論述。過去即有學者以程敏政〈奏考正祀典〉爲研究核心，指出孔廟從祀標準由此轉而更重垂教世人的功效，故從祀儒者的德行表現遠重於學術成就。⁵¹這樣的觀察，如果從明初以來各朝臣對從祀儒者的品評來看，確實可以在其奏議內容中，梳理出滿足此一論點的依據；然而，若進一步追究這種關注從祀者德行表現的潛在動力，以及要求增、黜從祀儒者的論據，則程朱理學的關鍵地位應是不容忽視的。基本上，程朱理學在知行觀主張致知先於力行，是爲學的基礎；而力行重於致知，則強調致知的終極目標乃在於德行的踐履，二程所謂：「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⁵²即是極具代表性的總括。是以，對於崇奉程朱理學的明儒而言，一旦德行表現「無疵於公議」，則表示在致知的領域中已然已臻至完善，那麼，傳世著述的有無或多寡，便不是首要檢視的條件了。此一脈絡，從上述王禕、劉定之、張九功奏疏來看，即是有力的佐證。再從程敏政的疏文來看，其主張罷祀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等人，除承襲前說，細數這些先儒在學術成就上不足稱道之外，且生平德行表現不符「公議」；至於這些先儒的著述在過去被稱譽爲「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但程敏政直言這些漢魏儒者僅是從事「訓詁」⁵³工作，並言：

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⁵⁴

⁵¹ 參見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頁35-86。

⁵² （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二程全集》），卷1，頁1188。

⁵³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卷10，頁171。如批評劉向「喜誦神仙方術……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專一附會圖讖以致顯貴」，王弼「所注《易》專主老莊」……等。

⁵⁴ 同前註，頁171。

即使從經典傳注、授受的角度來論從祀資格，程敏政仍是擇取了程朱系統的經書傳注以取代漢魏經注，也就是說，程朱理學才是此一時期「報功」的終極原則。再者，程敏政建請從祀王通、胡瑗，均「斷之以程朱之說」；⁵⁵在論述宋儒楊時從祀問題時，更明言：

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⁵⁶

在程朱理學發展歷程中，楊時是承續二程、下啓朱子的關鍵人物，其於弘治 8 年（1495）從祀孔廟，背後的意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程敏政在這篇建請從祀楊時的奏議中，清楚地昭示了楊時應入祀的原因，即在於程朱理學傳衍地位，至於著述不足的事實，並無礙其立足兩廡之資格。當然，也正由於這種「斷之以程朱之說」的「報功」判準逐漸強化，以至要求罷祀荀子之論更趨顯著；而反對更置者，勢必亦以程朱之說作為攻駁內容，上述倪岳的奏議便是鮮明之例。按此脈絡，便能清楚地理解，荀子遭黜祀的真正原因，實不在於經典著述不足，亦非德行表現之疵，而是在於所言性惡、禮偽、非十二子等所呈顯的學術主張，不見容於程朱理學；或許更準確地說，在明儒的認知裡，程朱理學對「聖人之道」的貢獻大於漢魏經書傳注，是以，此一時期的「報功」，是以程朱理學為內涵的。現代學者黃進興曾詳細梳理了嘉靖孔廟改制內容，對於從祀儒者的增、黜，他認為最能彰顯時代精神的是以「明道之儒」來取代「傳經之儒」，⁵⁷在此，或可藉由本文的分

⁵⁵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卷 10，頁 173。

⁵⁶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龜山先生從祀議》，卷 10，頁 174-175。

⁵⁷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頁 217-311。案：尤其頁 275。

析，能更進一步指出，嘉靖從祀儒者的更置實是以「程朱理學家」取代了「漢唐經師」。

四、結語：時會遷流，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

荀子自宋代從祀孔廟後，即屢遭抨擊，至明嘉靖年間張璁主持孔廟祀典改制，正式於更新從祀名單中剔除。梳理明代議禮奏章中的相關內容，首先，不難發現，主張廢祀荀子的論述遠多於反對者，且對於荀子的抨擊，由學術思想擴及生平事宜（任蘭陵令、弟子李斯），即使仍有反對更置的聲音，然最後還是淹沒於「報功」內涵的轉化之中；至此，荀子終究失去了侑食「冷豬頭肉」⁵³之位。

其次，透過荀子從祀與否的討論，實可勾勒出明儒在思索從祀課題上的演變：由明初宋濂抨擊性惡開始，到劉定之擴及生平行誼，再到張九功、程敏政逕以程朱之說批判荀子，呈顯出程朱理學一系自南宋朱子從祀，獲官方兼容於儒學傳承貢獻之一後，在明代逐步定於一尊的歷程，而荀子學術在二程、朱子的訾議中，似乎早已能預見其黜祀的命運。

然而，若能跳脫純就是否符合程朱理學體系為從祀標準，實際上明代從祀的改革，乃實踐了他們建構以「報功」為思考模式的從祀制度。基本上，這些議禮的官員都認同從祀的目的在於「報功」，即對聖人之道有所貢獻者的崇敬，不同時代的儒者對聖人之道的貢獻自然有所差異。嘉靖 19 年（1540）禮部總結回覆累朝官員奏請從祀薛瑄（1389-1464）之議，對於當時質疑薛瑄「罕所著述」，其言曰：

從祀之典，崇德報功。……求士於漢唐之世，聖學榛塞，固當專錄其釋經

⁵³ 在此借用郭沫若所評價《荀子》之言，郭氏認為荀子思想並非純粹儒家，而是荀子門人吸取百家眾說之「術」而成。郭氏言：「文廟裡面的冷豬頭肉才沒有荀子的份，這怕就是那些言『術』的竄雜成分誤了他吧！」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 年），頁 153-181。引文見頁 181。

之功；自有宋諸儒繼出，理學大明之後，世之儒者雖論述罕傳，似當特取其履行之實。⁵⁹

這段文字說明了從祀是爲了「報功」，由於時代背景不同，故而漢唐時期以「釋經之功」的儒者從祀；宋代以後則擇取有「履行之實」的儒者從祀，無論是「釋經之功」或是「履行之實」者，都是對聖人之道有所貢獻者，因此，著述的多寡不該成爲單一從祀標準。⁶⁰此一思維模式即是將明初以來對於從祀議論的總結。清儒秦蕙田論析了唐宋時期的從祀情形，指出其間變化義旨有二，一是傳道，一是傳經。又言：

夫道與經無可分之理，然當時會遷流，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逮乎前朝（案：明朝），或以真儒碩學不見著作爲疑，或以註疏專家不修實行被黜，其意似欲強而合之。然不如明嘉靖時禮臣之議，謂「求士於漢唐之世，聖學榛蕪，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儒出，理學大明，雖議論罕傳，自當特取其履行之實。」為篤論也。⁶¹

秦蕙田不僅認同嘉靖 19 年禮部官員的主張，且更點出了從祀之制的思維模式，即所謂「時會遷流，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換言之，明初以來包括荀子在內的從祀更制議論，正是建構了「報功」思維模式的歷程，呈現的原則即在於不同時期的儒者對聖人之道的貢獻各有不同。若依照明儒所建構的思維模式，從祀與否應取決於儒者在當時代的發展及所肩負的意義，則現今能與當代儒學接榫者，荀子可說是極爲恰當的人選。黃進興便從「儒學的發展階段」、「時代意涵」二方面

⁵⁹ 轉引自（清）秦蕙田：《五禮通考·祭先聖先師》，卷 120，頁 908-909。

⁶⁰ 案：此次禮部雖點出了從祀的思維模式，但最終仍以程朱弟子羅從彥、黃幹等人尚未從祀，近時儒者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尚未從祀爲由，駁回了此次建請薛瑄從祀之議。這也顯示，從祀與否涉及的事宜相當細瑣繁多，本文僅就朝臣奏議之一隅而論。

⁶¹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祭先聖先師》，卷 120，頁 913。案：秦蕙田本段徵引明儒禮部之文字與上段引文文字略異。

說明荀子足以從祀孔廟；前者是從原始儒家荀孟並舉、學思並重來看，後者則強調荀子「重學」，能夠發揮、補足儒學在現代的完整性。⁶²現可更進一步而言，若從儒學全球化的觀點來看，近代東亞儒學圈、英語世界對於荀子學的研究，不僅數量持續增加，且在各種議題的深化或拓展也都有豐碩的成果，自不應忽視。⁶³在儒學動態的發展與多元的趨勢前提上，倘若荀子得以復祀孔廟，必當深具時代意義。

附錄：明代朝臣議論荀子從祀孔廟表

序號	時間	朝臣	對荀子之評述	主留祀或罷祀	備註
1	明太祖 洪武初年	宋 濂	批評其性惡	罷祀	
2	明太祖 洪武年間	王 禕	批評其性惡	罷祀	以荀子突顯其他先儒進祀的正當性。王鏊、曹銘亦採此手法

(續下表)

⁶² 黃進興：〈荀子：孔廟從祀的缺席者〉，頁 303-304。

⁶³ 參見王靈康：〈英語世界荀子研究概況〉，《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11 期（2003 年 12 月），頁 1-38。近 20 年來舉行多次荀學相關研討會，會中多有學者評述荀子學研究在日、韓、歐美國家之成果：（1）2006 年 2 月 18-19 日臺灣雲林科技大學舉行「荀子研究的回顧與開創」國濟學術研討會，會後刊登了佐藤將之：〈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82；鄭相宰著，石立善、閻淑珍譯：〈韓國荀子研究評述〉，《漢學研究集刊》第 3 期，頁 183-220。（2）2013 年 10 月 13-14 日山東臨沂蘭陵縣舉行「荀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刊登了李哲賢：〈二十世紀日本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綜述〉，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522-531；申斗煥：〈關於朝鮮儒者的《荀子》思想研究〉，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頁 539-547；李承模：〈韓國荀學研究動向〉，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頁 594-613。（3）2014 年 6 月 9-10 日河北邯鄲舉行「荀子研究的回顧與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刊登了佐藤將之：〈二十世紀《荀子》研究綜述：由國際視野的比較與回顧〉，《邯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5-16；後收入佐藤將之：《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評析·前景·構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頁 93-122。

序號	時間	朝臣	對荀子之評述	主留祀 或罷祀	備註
3	明憲宗 成化年間	劉定之	批評其性惡、禮僞、侍黃歇、李斯爲徒；朱子書於楚以陋之肯定荀子有希聖之心，謹守規矩，足以爲孔門徒黨	留祀	明確主張品評先賢「從朱子而已」
4	明孝宗 弘治元年 (1488)	張九功	批評其性惡、禮僞、侍黃歇、非十二子、學術雜申韓，朱子書於楚以陋之	罷祀	批評荀子範圍最廣
5	明孝宗 弘治元年 (1488) 8月3日	程敏政	批評其性惡、禮僞、非十二子，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	罷祀	程敏政此一奏議後爲張璁抄錄上呈
6	明孝宗 弘治元年 (1488)	倪岳	認同荀子首明王道、推尊孔子；強調程朱不曾對荀子從祀置喙一詞	留祀	明孝宗下詔「是從祀諸賢都照舊不動」
7	明世宗 嘉靖9年 (1530) 10月18日	張璁	引錄程敏政奏章上呈明世宗	罷祀	荀子自此遷謫出孔廟從祀之列

徵引書目

(一) 引用古籍

(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二程全集》）。

(宋)蘇軾：《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人傑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5冊）。

(宋)熊鈺：《熊勿軒先生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正誼堂全書》）。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

編》第 67 冊)。

- (明)王禕：《王忠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6 冊)。
- (明)薛瑄撰，孫玄常等點校：《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明)陳文等纂：《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 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
- (明)劉定之：《呆齋前稿》(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 22 年楊一桂補刻本)，集部第 34 冊。
- (明)劉健、謝遷等纂：《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
- (明)倪岳：《青谿漫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1 冊)。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奏考正祀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2 冊)。
- (明)張璁：《張文忠集》(臺北：國聯圖書，1968 年，陳子龍、徐孚遠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 12 冊)。
- (明)徐階、張居正等纂：《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據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
- (明)朱厚璉、張孚敬：《諭對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萬曆 37 年蔣光彥等寶綸樓刻本)，史部第 57 冊。
-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年，王挺之等編：《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歷史文獻叢書》影印明萬曆 35 年刻本)。
- (明)徐學聚編輯：《國朝典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
-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 年)。
-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紀昀等總

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 冊）。

（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年）。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佐藤將之：《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評析·前景·構想》（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5 年）。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 年）。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1994 年）。

黃進興：《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三）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王靈康：〈英語世界荀子研究概況〉，《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11 期（2003 年 12 月），頁 1-38。

田澍：〈關於張璁義理思想論述——對張璁在大禮議中「迎合」世宗之說的批判〉，《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1-7。

佐藤將之：〈二十世紀《荀子》研究綜述：由國際視野的比較與回顧〉，《邯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5-16。

佐藤將之：〈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82。

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第 56 期（2015 年 12 月），頁 35-86。DOI: 10.6253/ntuhistory.2015.56.02

吳靜芳：〈明嘉靖朝孔廟祀典改制考析〉，《成大歷史學報》第 31 號（2006 年 12 月），頁 113-152。

張立文：〈論張璁的「大禮議」與改革思想〉，《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頁 12-19。

張璉：〈明代嘉靖朝宗廟禮制變革與思想衝突之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 24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8。

彭珍鳳：〈先賢先儒從祀孔廟東西兩廡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33 卷第 3 期（1982 年），頁 53-116。

趙克生：〈試論明代孔廟祀典的升降〉，《江西社會科學》第 6 期（2004 年 6 月），頁 104-110。

鄭相宰著，石立善、閻淑珍譯：〈韓國荀子研究評述〉，《漢學研究集刊》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183-220。

2. 論文集論文

申斗煥：〈關於朝鮮儒者的《荀子》思想研究〉，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539-547。

李承模：〈韓國荀學研究動向〉，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594-613。

李哲賢：〈二十世紀日本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綜述〉，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522-531。

The Course and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 Tem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bolish the Xunzi of sacrifice

Tien, F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iterature,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o 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Temple means that into the Confucian Sanctuary, behi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way of recognition of the saints, therefore, even if the monarch is still the final ruler, but the choice of the worshipers become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wrestling field, Confucianism in the flow of Taoism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forum. This article first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to Jiajing period memorials, “*Record*”, Confucianism and other judgments, combing the abolish the Xunzi worship process, the real reason, it is not the lack of classic writing, nor is the performance of virtue, But rather that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gainst the theory of twelve, etc. were published in the academic proposition, not only to Cheng Zhu Neo-Confucianism. Second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thinking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event of the abolition of Xunzi worship should be measur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ward merit”, that is mean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sag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thinking constructed by Ming Confucianism, with the decision on the contribution of schola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times, in the premise of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pluralism of Confucianism, Xunzi can be said to be connected with modern Confucianism. The best candidate, if to re-worship Confucius Temple, must be deep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of Xunzi academic, Confucius Temple, With the worship, Cheng Zhu Neo-Confucianism